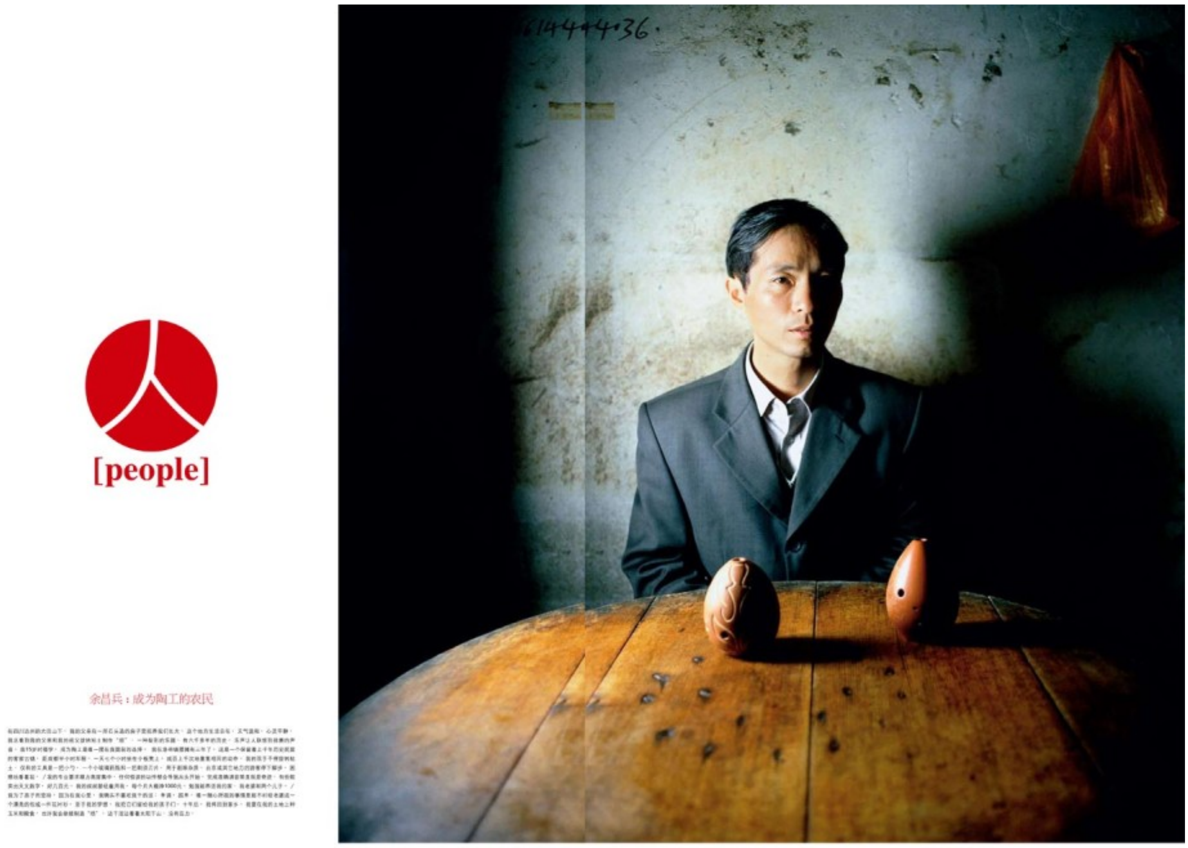


人

[people]

余昌兵：成为陶工的农民

LIFE MAGAZINE

人

[people]

余昌兵：成为陶工的农民

在四川达州的大巴山下，我的父亲在一所石头造的房子里抚养我们长大。这个地方生活自在，天气温和，心灵平静。我从看到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旋转粘土制作"埙"，一种梨形的乐器，有六千多年的历史，乐声让人联想到挽歌的声音。我15岁时辍学，成为陶工是唯一摆在我面前的选择。我在洛带镇摆摊有三年了，这是一个保留着上千年历史民居的客家古镇，距成都半小时车程。一天七个小时坐在小板凳上，成百上千次地重复相同的动作，我的双手不停旋转粘土，仅有的工具是一把小勺、一个小玻璃药瓶和一把剃须刀片，用于剔除杂质。北京或其它地方的游客停下脚步，因感动看着我。/我的专业要求精力高度集中，任何错误的动作都会导致从头开始。完成准确调音常常就是奇迹。有些能卖出天文数字，好几百元。我的叔叔曾经雇用我，每个月大概挣1000元，勉强能养活我的家，我老婆和两个儿子。/我为了孩子而坚持，因为在我心里，我确实不喜欢我干的活：单调，孤单。唯一称心所欲的事情是能不时给老婆送一个漂亮的包或一件花衬衫。至于我的梦想，我把它们留给我的孩子们。十年后，我将回到家乡，我要在我的土地上种玉米和粮食，也许我会继续制造"埙"，边干活边看着太阳下山，没有压力。

理解中国

摄影：安娜伊思 撰文：马地安 翻译（法译中）：向朋

“中国肖像”反映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中国，那些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日复一日地使中国的面貌千变万化。

一个卖羊肉串的小贩，一个广东的年轻女工，一个成都的心理分析医生，一个宁夏的农民，或者一个摇滚明星，这些人物都是安娜伊思（Anaïs Martane）在满含深情中，用她巧妙的玛米亚镜头捕捉到的，每个镜头都在讲述着一个故事，每个人的故事又都是独一无二的。

2007年，年轻的女摄影师安娜伊思（Anaïs Martane）在女记者马地安（Diane Droin-Michaud）的陪同之下，走遍了中国的各个省份，记录下了这些带着微笑的，忧郁的，沉思的或者各种其他表情的面孔，每个人置身于自己的特定环境之中，流露出不同的内心思绪，展示着各色职业生活，这些瞬间便是他们的生活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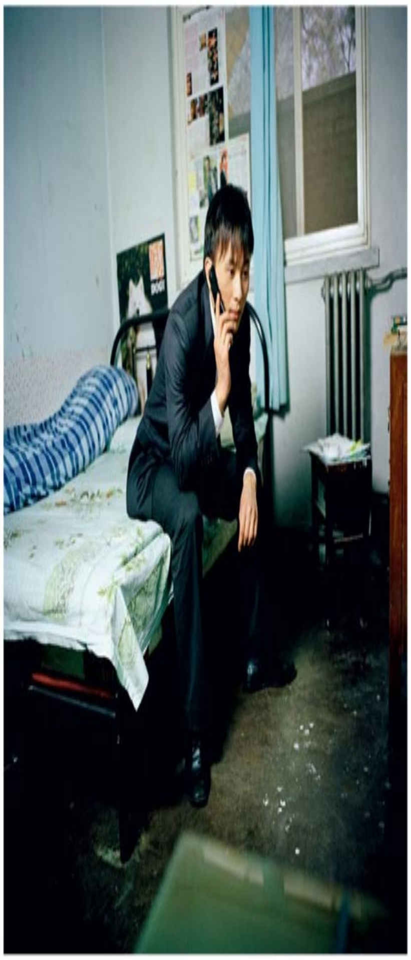
尹丽川态度明确地表明了她在中国比国外自由：“我在巴黎的四年不是很愉快：我在那里发现的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世界，制定了太多的规矩。大致比较，北京看上去是一个热闹的城市，到处迸发着火花，虽然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的城市，但充满活力。”

对于女工张玲玲，吸引她的是离开农村之外的那个世界。“整个青春期，我听朋友们讲‘那些地方’，那些他们碰运气，衣锦还乡的神秘地方。‘那些地方’，想象中的大城市，可以出去玩，遇到一些人，购物。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是我渴望走出大山，找到自己的路。否则世界太狭窄，没有未来。”

玩世写实主义艺术家岳敏君，始终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因此，我决定嘲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哲学，我的思想自由。我不在乎一切，至少我尝试着：宗教，国家，商业，金钱……假如上帝或火星人看到我的作品，他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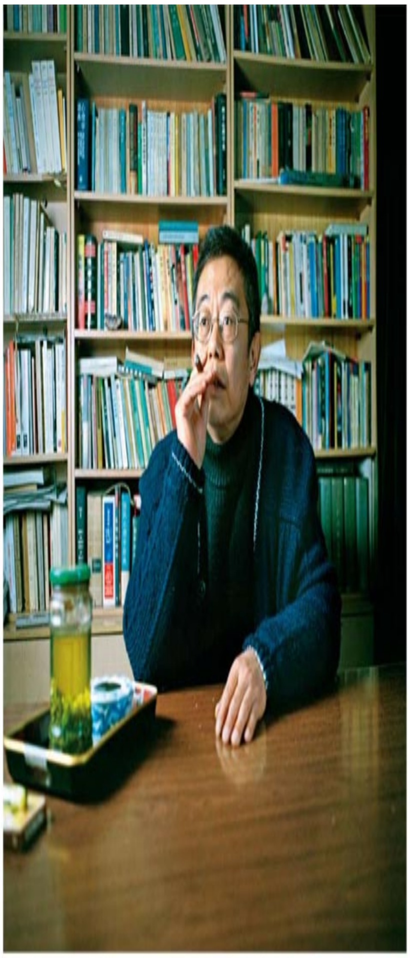
……

马地安（Diane Droin-Michaud）的文字与画面相得益彰，这能使观众更好地理解中国，至少可以在片刻的一瞥中，了解这些使中国充满活力的人们，了解他们心中的梦想或者眼前的现实，了解他们看世界的眼光和方法。



赵伟：压力下的房地产经纪人

自问，自省，想心事，太奢侈了，我没有时间。我在北京的一家房产中介工作，每天12小时，每周6天，7点半起床，匆忙喝下早餐，赶去参加8点半的会议，上午带客户参观公寓，参观间隙，必须处理办公桌上成堆的没用的行政文件，下午重复同样的工作，直到晚上8点半，一天中还要接几十通电话。如果每个月能卖掉一所公寓，已经很不错了，两三百万元的售价，我的提成大约是0.1％，我的固定工资大概1200元，通常收入在4500元左右。／早上我想到的头一件事是达到我的目标。5年后，我希望能够买一辆车，月收入达到25000元。10年后35岁，如果一切顺利，我将结婚，有一个小孩，到那个时候，也许我会对其它事情感兴趣，去旅游，为什么不，或者自己做点小生意，甚至考虑生命的意义！／目前，这些都不在我的日程里，我一个人生活，还要帮助父母，他们一直住在我们老家河南的一个村里，我深知自己对他们的责任重大。／在工作中，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时候感觉自己完全慌了手脚，有点像足球赛：好多事情无法控制，沮丧，意外等交织——当压力过大的时候，我回家冲个澡，换身衣服，钻进一家酒吧喝杯啤酒，我尝试每周一次健身，作为一种减压方式。因为没时间，我很少出门，爱情在我的生活中还没有找到位置，可是谁愿意嫁给一个幽灵呢？



张玲玲：一个女工的梦

我离开陕西农村老家，因为我想见识世界。我听人家说在“那些地方”碰运气，可以出去玩，遇到一些人，购物。那是想象中的大城市。我渴望离开大山，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我就肯定一件事：我不会再是农民，跟父母一样卖菓子，模样成样子。/2005年我18岁，先到了广州，在一家卖酒的公司做推销，我遇到了从云南来的王良学，后来成为我的伴侣。他开始在一家地砖厂当工人，也不满足于得过且过。我们下班后见面，聊天，想象开一家小型商务公司，自由安排工作，幸福地在一起。我们上网找到一家生产芳香剂的，叫做“鑫祥”的厂家的联系方式，老板说他愿意将生产秘方以10000元的价格转卖给我们，于是我们开始存钱。/良学最终换到东莞一家为外国公司生产扬声器的工厂，我很想他。八个月后，我被他所在的厂雇用。一个星期后，我实际每小时能够装配115个零件，比其他女工多出很多。我组装扬声器的最精密的核心部分，需要精神高度集中，有时精神疲劳，这时我就去卫生间往脸上泼水。每天正常工作八小时外，我还加班三小时，这样每月能挣1300元，良学的工资大概是1900元。在这个工厂没有任何未来。我和良学数着我们的钱，为了能够离开这里，开我们的芳香剂公司，最终去“那些地方”，我们梦想的地方……

霍大同：阅读中国人的无意识

成都大学历史专业毕业后，我被政府分配到北京故宫博物馆。1977年那个时候，人们不可能选择职业。这期间，我遇到很多人，其中有后来成为著名电影导演、作家的戴思杰，《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和《狄的情结》的作者。还有另外一个四川的朋友，我们三个每周日在我的住处，故宫旁边的小公寓见面。我们发现了西方哲学家，黑格尔，康德，柏拉图——那时候，我们年轻，叛逆，是理想主义者。/在精神分析领域，中国滞后了一百年。我最初是通过非法渠道发现基本著作的，首先受到弗洛伊德思想和《梦的解析》的冲击：潜意识会是性冲动？欲望压抑导致我们的病苦？消除压抑，你们将幸福！我一直被他书中所言，直到发现拉冈，当他谈到“潜意识的结构就如语言”的时候，终于让我能够将精神分析应用于“中国模式”，尤其是通过性格研究。对我个人而言，他让我认识到我是谁，我的缺陷，我的不足，他还给我勇气，让我无所畏惧地接受衰老和死亡的概念。他用这样哲理而极其深刻的思想把我造就成一个幸福的男人。现在的中国，人们似乎迷失了：“我来自哪里？去向何方？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到1990年中国才开始关注精神治疗，不再恐惧它。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我们经历着各个领域巨大的变化：社会，经济，地理，认知，这些问题依靠道德方式处理。

天德神父谭：坚定的信仰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点像生活在旅馆里，当我去天堂的时候——当然，如果天主判定我应该进入天堂的话——那时候我将有真正回家的感觉。工作，消费，度假，政治……社会上所有跟人类有关的这些事情，和我关系不大。自从我1916年出生，特别是三个月大的时候受洗礼开始，我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天主的世界。我向天主献出我的一生。/20岁出头时，我住在石室圣心大教堂的神父住宅，教堂位于我的家乡广州，我对这个地方感情深厚。1941年，我是在那里被任命为教士的，那时我25岁，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神圣的时刻，也是天主最宝贵的礼物。我们正处于日本占领时期，我给很多同胞行洗礼，祈祷，给村民涂圣油，内心平静。/现在，年纪大了，我需要更多的精力传授耶稣的教义。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到小教堂祈祷，六点半吃一顿丰盛的早餐。白天，我接见来自各省的教徒，听他们告解，试着依据耶稣的教义回答他们的重要问题。部分人好奇地想更多了解我，询问我在中国北方的黑龙江省30年的劳改，劳动改造营的情况。“流放，贫苦，寒冷，你怎么能忍受这些？”他们激动地问。我努力让他们理解牺牲是我生命全部的意义……“为他生为他死”是我在成为教士的时候许下的誓言，我永远不能忍受背叛他的意志。

李爽：身不由己的护士

我讨厌护士这个职业。五年来，每天早上不得不去医院，整天都不能出医院，工资每个月1300元，生活单调，郁闷。唯一让我舒缓的是我和部分病人的关系，因为病人总是尊重医生，而护士却常常遭到毫不客气的辱骂。成都国际医院和别的医院不同，它专门为富商和外国人服务，这里不接收普通病人。看，那边大门墙上用金色大字写着：VIP医院。医院刚重新装修，病床增加到一百多张，医院从三星级升至五星级，房间，确实很漂亮，空间很大，而我却想为离开这里付出一切……/我承认自己从来不想做护士。16岁那年，父母对我说：乖女儿，如果你以后想成家的话，就必须有一个体面而稳定的工作，按中国传统，男人更喜欢女人是医生或银行职员，所以我们决定把你送到一个专科学校学护士专业。两三年后，你就能挣钱并且遇到一个男人……我一下子惊呆了，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重要谈话，就这样父母以传统的名义主宰了我的命运。而我初中常想上服装设计学校！我觉得很伤心，我肯定恨他们！但我也爱他们，尊敬他们，但我决定抗争，独自创造未来。我已经计算过：需要10万元开一个化妆品及饰品店！成都的女孩漂亮，爱打扮，肯定有市场。父母方面，我会等事情完成了再告诉他们，让他们失望？可能吧，但是我已经准备冒险了……

尹丽川：自由女作家

我总觉得自己怪异，孤僻……有点像她书中的人物：如同流浪，艺术家，一份不在乎一切，排斥任何权威，鄙视社会法律，长期生活在乌托邦理想国中的人。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会儿，我16岁，成天不学习，跟朋友们上街，去公园，读书，争辩，批评"制度"，我根本而热情，倾向于可以选择的集体生活，而不是强加的。/在北大学习四年后，我去巴黎学习法国文学，又一次任性地逃避父亲的控制。我读加缪，贪婪地欣赏法国电影，比如《早上37°2》和《新桥恋人》。那个年代，我差点和一个法国人结婚——我也担心：我为西方文化着迷，多数人认同的文化，个人主义文化，却是终僵化的文化。因为，除了一段我并不感到遗憾的、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外，我在巴黎的四年不是很愉快：我在那里发现的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世界，几乎所有巴黎人身上都缺乏想象力。生活"保守"而沉闷。北京看上去是一个热闹的城市，到处迸发着火花，就像[illegible]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样！一个至今仍坚持被西方民主遗忘的某些价值观，比如尊敬长辈，家庭团结，利他主义的地方。/1998年带着乡愁回国，准备投身电影，但这个[illegible]城太繁杂，我宁愿改变方向，写作对我来说，是回归源头。你们对此可能觉得好奇，但是在这样的中国，我感觉自由，的确，自由……

王吉生：甜中带苦的退休

我们家五代都是北京人！我的祖父在英美使馆做厨师，我的父母在北京友谊宾馆工作。15岁那年，我在市区的公园里偶遇一位满族师傅，他教给了我形意拳，也把传统的中医和按摩传授给我，这成为我后来一生都没有丢弃的手艺活儿。不久"文革"爆发，某天清晨，我和18岁的哥哥及表哥登上开往陕西延安的火车，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九点在地里劳动，饥饿难忍，我们没吃的，没电，没有自由。好在有被我带上火车的一整箱书：《红楼梦》、《三国演义》，唐诗和几本巴尔扎克的书。后来我被派到陕西省南部城市的工厂工作，再后来廊坊的中国石油聘用了我。/1973年，我的月工资是49元，30年里，我们辛苦工作。53岁，我被认为"无能力"而遭解雇。靠着几个熟人的关系和从书上了解的法律常识，我最终被列为提前退休。退休金是每个月1215元，我妻子每个月1400元，仅够还每个月2200元的房贷，要还20年。当然也靠儿子帮忙，也多亏按摩的证，我还有一小部分私人顾客增加收入。最近我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的妻子因为乳腺癌需要治疗，我急需130000元让她入院，我们没有任何社保，不够预支，平均要付80%的医药费。我没有其它办法，只能向亲戚朋友借。晚上，在我们安静的房间里，我和妻子谈到将来。我们向老天爷祈祷不要得病……

岳敏君：嘲笑世界的艺术

我是一个玩世写实主义者，我塑造的咧嘴大笑的人物形象诠释了一种宿命：贫穷或富有，熟悉或陌生，好或坏，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事物的进程。我们生活在永恒的阴阳矛盾中，明亮与阴暗，和平与战争，善与恶，世界总是在这样的矛盾对立中运动。因此，我决定嘲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哲学。我不在乎一切。假如上帝或火星人看到我的作品，他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人类从暴露一切：忧郁、高兴、希望、绝望、幸福、不幸……人性在中间摔倒。/从出生开始，注定的遗传基因不能改变，我们只能学着掌控它。我的遗传基因，就是叛逆。1989年后，我选择艺术作为唯一的语言形式。我带着一头长发和自由的思想搬到了北京的圆明园艺术家村落。我们聚集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每月仅100元，我们却是世界的主宰。白天疯狂热地画朋友的肖像，晚上我们喝下十几瓶二锅头，忘乎所以。……外国人来看我们，一些人几乎不花什么钱就买走了画，只是在他们那以昂贵的价格转卖，商业逐渐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如今，我的画卖到数百万。这是体制的嘲讽。最终我感兴趣的，是默默地观察人类发展。/每一幅画体现了我的一个性格特征，一种观念，像一个民间艺术家，就是我最珍贵的愿望。以后？谁能保证永恒呢？

吕燕：超级模特

我于1981年10月19日生于江西省一个四面环山，濒临长江的小乡村。我的父亲是理发师，剪一个头挣两元钱，我的母亲在工厂当临时工。富有对我来说，就是能够买糖和饼[illegible]苹果。/我对时尚一窍不通，我们的黑白电视机只放中央电视台。我一米七八的个头，更像个假小子，经常逃学躲到[illegible]。父母每天都提心吊胆。最终父母送我去南昌一所模特学校……多亏这次机会，我和其他五个人一起被挑选为代表这座城市参加在北京举办的模特比赛。当时我16岁。对评委们来说，我既不漂亮也不丑，我很特别——“特别”这个词此后紧紧跟随我……我打电话告诉母亲我想在北京碰运气，让她给我寄点钱。她向全村人借了1500元钱，这足够我在一间斗室生活4个月，每天去食堂。不久我遇到了两位“天使守护者”：李东田和冯海。1999年7月28日，我第一次拍片，没有化妆，在我的眼睛下方还有很多雀斑。这张照片引起轰动和争议。2000年，法国大都会模特经纪公司在北京一家饭店里发现了我，给了我一个充满前途的未来。我在老家花三个月拿到护照，然后我到达巴黎，头脑一片空白，一切来得太快。六个月以后，我改变了。现在，我讲英语，和我的恋人咕噜几句法语，从纽约到北京，从伦敦到马拉喀什，在任何地方我都感觉自在。我给父母买了房子，供弟弟和妹妹上学——中国人感情不外露，很是顾家。作为家中老大，我觉得自己肩负全家的责任。